



斯图亚特·霍尔 的文化理论研究

► A Study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Theory

▼
邹威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斯图亚特·霍尔 的文化理论研究

► A Study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Theory

邹威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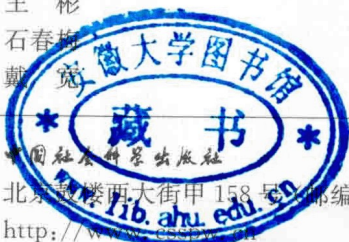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邹威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61-4902-7

I. ①斯… II. ①邹… III. ①霍尔, S. (1932~2014)—文化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379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竟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沙滩后街55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n.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化研究的原点与拓展

——邹威海《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序

邹威海的新著《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即将付梓，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庆贺不仅因为这是他多年努力耕耘的成果，更让我想起与文化研究有关的种种问题。

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研究产生兴趣、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主要是大学学术体制内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以及少部分从事传媒研究的学者。文化研究的原点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如今拓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研究中心的地形图在地理上急剧扩张的同时，在研究内容、方法和立场方面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的经典著作《识字的用途》将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他们受到的文化影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研究主旨是工人阶级“活的文化”，意在摆脱大学教育体制内的文学研究关注经典及其传统的束缚和局限。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整体生活方式”，与霍加特的主旨一致。从斯图亚特·霍尔接替霍加特担任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掌门人开始，文化研究的中心便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从“活的文化”转向了关注理论问题，诸如文化霸权、族裔散居、接合理论，等等。如今，大学体制内的文化研究，包括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内，几乎全然把文化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对文化研究的学者或重要著述的研究之上。换言之，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然变成了对文化研究的理论研究，变成了学者们书斋里的“学问”。

从现实生活中的“活的文化”，到体制内和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这种演变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不仅如此，在“活的文化”背后，有着“我们”与“他们”的阶级关系，也有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影响，还有作为家庭之核心的工人阶级家庭主妇的女性形象，更有从乡村到城市的巨大反差和社会转型，由生活方式塑造出来的内在“情感结构”，等等。有人说，文化研究的核心有一个所谓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即阶级、性别和种族。其实，从文化研究的原点看，核心应当是阶级（尤其是中下层阶级）内在的家庭生活与情感生活，以及外在的社会生活（劳作、交际、休闲娱乐、教育等）。从生活到书斋的演变，实际上意味着关注点和性质的转移。虽然文化研究的领域早已大大拓展，但我们不能忘记原点的启示性意义。

早期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大多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他们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痕迹。我由此想到的问题是：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文化形态同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种种不争的事实面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传统如何开拓新的局面，如何继续保持社会批判（而不是学术批判或哲学批判）的特色，如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续发展，成了文化研究应当关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趋势，如虚拟资本、弹性生产、剥夺性积累、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形象工业、媒介操控等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内心生活，理应提上研究议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早期的英国学者大多有工人阶级出身的背景，依靠自我奋斗和相关社会机制成为著名学者，并且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今天，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变化和新发展，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出现了断层。这应当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和反思的重要问题。

再说说中国当前文化研究的状况。我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接受的文化研究“遗产”，不仅来自西方世界，而且也主要是学院体制内的对文化研究理论的研究，是书斋内的研究，较少关注本土语境中的特殊问题以及本土理论遗产。这可能是中国目前文化研究最大的软肋所在，正如邹威华博士所说，主要停留在译介和评介之上，干脆说主要还在引进他人的资源。引进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本土意识和问题意识同样重要。我觉得，文化研究的原点，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显现出其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从活生生的生活状态出发，由此提出文化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从引进的理论出发，也不是从体制内的书斋出发。

邹威华博士通过对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体现出了研究资料的原始性、研究问题的语境性、研究问题的理论化、研究视野的多重性和研究主题的问题意识。这样的研究方法确实具有学术意义和价值，也为我们清晰地呈现出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的意义与价值。我希望，这是一个坚实而具有孕育性的开端，它应当在日后的生活与研究中诞生出更多、更加精彩丰富的成果来。

阎 嘉

2014 年夏于成都蓝谷地

目 录

文化研究的原点与拓展

——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序	(1)
------------------------------	-----

导论	(1)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19)
一 国外研究状况述评	(19)
二 国内研究状况述评	(27)
第三节 本书结构和研究方法	(36)
一 本书结构	(36)
二 研究方法	(38)

第一章 “文化霸权”理论启蒙	(41)
----------------------	------

第一节 “文化霸权”理论的历史追溯	(41)
一 “文化霸权”的内涵	(42)
二 “文化霸权”建构要素	(48)
第二节 霍尔与“文化霸权”理论启蒙	(55)
一 “无阶级的意识”	(55)
二 霍尔大众文化“霸权”启蒙	(62)

第二章 “文化霸权”建构与发展	(73)
第一节 “霍尔范式”理论	(73)
一 文化主义范式	(73)
二 结构主义范式	(78)
三 “霍尔范式”危机	(87)
第二节 葛兰西转向	(94)
一 “葛兰西转向”的内涵	(94)
二 大众文化与“文化霸权”	(104)
第三节 新葛兰西主义:接合理论	(113)
一 “接合理论”的内涵	(113)
二 接合理论与文化霸权	(121)
第三章 “文化霸权”实践批评	(128)
第一节 文化霸权与大众媒介	(128)
一 大众媒介与重返意识形态	(129)
二 “霍尔模式”理论	(141)
三 解码立场与优先意义	(150)
第二节 青年亚文化与道德恐慌	(159)
一 亚文化风格:抵抗与收编	(161)
二 道德恐慌:民间恶魔	(174)
第三节 撒切尔主义与权威平民主义	(189)
一 撒切尔主义	(190)
二 权威平民主义	(205)
第四章 “文化霸权”延伸:“文化表征”理论	(219)
第一节 现代性与族裔散居文化认同理论	(221)
一 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221)
二 族裔散居美学	(229)

三 霍尔族裔散居文化认同	(239)
四 族裔散居文化认同转向	(246)
第二节 文化表征与差异的政治	(255)
一 “表征的政治”	(255)
二 “差异的政治”	(267)
三 “接合的政治”	(274)
四 “他者的政治”	(283)
结语	(293)
参考文献	(300)
后记	(324)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①

20 世纪发生在西方学术界与思想界最重要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之一是 50 年代从传统的英国文学学科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的兴起。这种“文化研究”顺应了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诉求,逐渐颠覆了英国传统文学学科中的“精英文学”,把“大众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媒介等视为理论学界在现实语境中关注的聚焦点,逐渐实现了“精英文学”研究中的“大众文化”转向。这种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是 1964 年年初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由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发起并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共同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以下简称为 CCCS),文化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CCCS 于 1972 年创办了《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②,宣布将“文化研究纳入理性的地图”。

^① 邹威华:《论斯图亚特·霍尔对文化研究贡献》,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②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出版物除了期刊《文化研究工作报告》以外,还包括不定期论文集(*Occasional Papers Series*)或蜡纸不定期论文集(*Stencilled Occasional Papers*);各种集体性著作;左派期刊《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左派评论》;以及其他期刊,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期刊《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等,这些期刊和集体性著作不仅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注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发声平台,更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行学术创新的特色和亮点,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关注和研究该中心学术思想发轫的语境和必读参考书目。

到如今,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它已经成为并将持续作为一门为各路学者不断研究的“显学”。这种“显学”所结出的硕果和研究思想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或“英国文化批判学派”。

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化研究”就已经成为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持续关切的对象。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都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追捧,致使文化研究持续不断地升温。由此文化研究传统就成为继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知识话语传统之后的又一重要的文化批判传统,这种传统又称为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英国,它密切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英国语境下对资本主义话语权力的批判和反思,坚决抵制和颠覆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批判性和实践性;这种传统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并不断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立场,批判、反思并修正经典马克思主义,践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考量和批判;这种传统也充分重视政治的介入性和现实的语境性,它是一种来自社会、文化现实的话语批判;这种传统与英国当时的左派工人运动、新左派、成人教育关系极为密切。

这种传统特别关注“大众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把“大众文化”从“精英文学”研究中解放出来,使“大众文化”获得了自主的、具有能动性的话语空间,充分解放了受众的地位,认同到“大众文化”有一个双重支点,它意味着“大众文化”在现实的表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蕴含“抑制”和“对抗”的双向运动,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进行协商、妥协,乃至斗争的一种场域,是实现霸权与反霸权,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表征与反表征的一种场所。

总之,以上的认识突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传统的文化特质,是对伯明翰学派研究内容的总体把握。以历史的视角纵观整个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流变,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传统包括了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发轫

期和伯明翰学术传统的发展期。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发轫期主要聚焦批评素养、工人阶级文化、阶级、成人教育、新左派文艺理论、历史、语言等主题。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发展期关切青年亚文化、种族、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接合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情感结构、现代性、媒介与受众、电影、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美学、身体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文本与权力话语、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差异的政治、表征的政治、族裔散居美学、他者的景观、晚期现代性、后殖民以及多元文化理论等主题。具体来讲,伯明翰学派具有以下学术传统:

第一,伯明翰学派工人阶级文化的草根性和边缘性学术传统。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 P. 汤普森都出生于英国的工人阶级家庭,谙习工人阶级的辛酸和苦楚,对大众文化有天然的感知,并持有同情之心。同时,他们的成名作《识字的用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皆强力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的情感结构,这些著作已被后来学者认定为伯明翰学派思想史的奠基之作和开创之作。

第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跨学科的传统。这种跨学科具体体现为跨越学科自身的边界,把诸多学科如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教育学以及哲学等统摄在文化研究的版图中,把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融入文化研究的学科版图中,深度关切边缘文化、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研究,注重个案研究、实证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实现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有机的大联合。

第三,伯明翰学派文艺理论研究批判的传统。伯明翰学派早期的文化研究以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等人为代表,他们是 CCCS 的第一代奠基人,也是精神领袖,还是左派利维斯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绝大多数著述都是颠覆“精英文学”的产物,被看成是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奠基性读本。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自身的学术背景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事业中潜藏着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痕迹。

第四,伯明翰学派种族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传统。以霍尔为代表的

CCCS 学者研究了欧美尤其是英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青少年亚文化,包括秃头青年、小流氓、嬉皮士、无赖青年、摩登派、牙买加小混混、足球流氓与朋克等。他们尤其把青年亚文化完全纳入种族研究的整个语境之中,在亚文化起源、亚文化风格界定、风格与媒介、风格与仪式性反抗、风格的收编、道德恐慌、民间恶魔以及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观点和见解。

第五,伯明翰学派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传统。这种传统颠覆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的观点,它不仅仅把大众媒介文化看成是国家强制机关用来捍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工具,同时还把大众媒介文化视为一个为整个社会所共享的公共空间,突出大众媒介研究中受众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开启了大众媒介研究中的“受众”研究。霍尔的《媒介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是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的开山之作,大卫·莫利对电视节目《全国观众》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他的著作《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凸显出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实证研究。这种大众媒介文化理论已经成为当下传播学学科的奠基性读本和经典读本。

第六,伯明翰学派研究方法上的“理论化”、“语境化”、“特定性”、“政治介入性”的传统。CCCS 学者针对英国具体而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语境,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借鉴、结合并整合了西方的文化理论资源,提出了深刻中肯的、独具匠心的理论问题,如“批评素养”、“文化革命”、“文化唯物主义”、“情感结构”、“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普通人不是文化傻瓜”、“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平民主义”、“霍尔范式”、“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接合理论”、“霍尔模式”、“道德恐慌”、“民间恶魔”、“仪式性反抗”、“文化收编”、“亚文化风格”、“撒切尔主义”、“权威平民主义”、“文化表征”、“新族性”、“表征的政治”、“认同的政治”、“差异的政治”、“接合的政治”、“族裔散居美学”、“他者的政治”、“多元文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对我们诠释伯明翰学派的学术生态、学术传统、文化特征、研究

主题和研究方法提供了非常中肯的认知空间和思考的路径。

第七,伯明翰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尽管在英国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滞后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随着伯明翰学派思想在英国的崛起,尤其是伯明翰学派对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吸收,马克思主义最终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英国得到了不断的接受和传播,伯明翰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充分的改造和诠释,孕育并产生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潮。它们坚决否定和排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把上层建筑中的“文化”从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石中充分解放出来,确认出“文化霸权”对建构社会秩序和维护支配阶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我们透视伯明翰学派所刻写的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武器和思考空间。

以上这些学术传统是伯明翰学派思想中重要的理论遗产和宝藏,体现出文化研究批判中重要的文化特征,它们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的学术界当下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伯明翰学派的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以其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立于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蔚然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追根溯源,这些学术传统都与霍尔有极为重要的联系,霍尔不仅是该学派的开创者,也是其思想的集大成者。霍尔把伯明翰学派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带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并不断壮大,茁壮成长,最终霍尔使伯明翰学派蔚然成为世界一朵盛开的学术之花,他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霍尔从参与创立 CCCS 以来,以其渊博的学识,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卓越的领导才能、组织和协调才能、驾驭全局的能力,充分利用他作为族裔散居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吸收和丰富西方各路理论思想资源,为伯明翰学派学术思想传统的纵深发展、为英国的文化研究,甚至为世界性的文化研究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伯明翰学派的学术发展史上镌刻着霍尔的印记,霍尔成就了伯明翰学派。在某种程度上讲,霍尔、伯明翰学派、CCCS 都是同义词,它们已经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标志性象征和文化意象,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学者对

霍尔以及霍尔对伯明翰学派作出的学术贡献都有极高的评价。伊格尔顿曾这样评价霍尔在当代英国乃至世界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任何一个为英国左派思想立传的人，如果试图依靠某个典范人物，将不同的思潮和时期串在一起，自然会发现他是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①“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巨擘，无人能出其右，这是他人格魅力和丰硕著述的结果。”^②格雷姆·特纳也对霍尔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在文化研究领域，霍尔的部分角色就像导管一样，把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引入英国的研究者和理论家视野中；在美国，他似乎也充当同样的角色，把英国的理论传输到那里。”^③陆扬和王毅曾指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文化研究的发祥地和精神源泉，伯明翰与文化研究同在，伯明翰就是文化研究。”^④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霍尔对英国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霍尔个人的知识轨迹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演进史，从“英国的”文化研究到“国际的”文化研究，霍尔不是别的——他通体都是“文化研究”。^⑤霍尔本人的思想认知“我是以终生的文化研究为背景写作的”^⑥和文化理论也给予了最中肯和强有力的回应，并佐证了霍尔为何自己一生都在致力于文化研究的事业了。所以，很大程度上，霍尔的思想是整个伯明翰学派的缩影，研究霍尔的思想就是研

① Terry Eagleton, "The Hippest",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996. p. 3.

② Chris Rojek, *Stuart Hall*. Polity: Cambridge, 2003. p. ix.

③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59.

④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⑤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认为：“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领向高峰，即使如此，他身上也带有明显的文学遗产的色彩。听过4号电台2000年2月18号‘荒岛之碟’（Desert Island Discs）节目的人就会知道，如果只让霍尔选择一本书带到荒岛上，他会选择亨利·詹姆斯的《一个贵妇人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这或多或少能反映出霍尔对文学作品怀揣的固有情结，纵观霍尔的思想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确实霍尔在伯明翰学派史前史时期，其思想中带有某种文学研究的特质，也难怪他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会选择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思想了。

⑥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陈永国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究整个伯明翰学派的思想；研究霍尔的思想就可以知晓和谙熟英国文化研究；研究霍尔的思想就可以为我们从事文化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这正是本书写作和思考的真正用意和目的。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02.03—2014.02.10），出生于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他是加勒比海非洲黑人后裔，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以及后殖民文化理论家。霍尔1951年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之后他一直在英国从事文化运动与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群体中的佼佼者，是新左派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他也是英国成人教育的践行者。在霍尔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集合 CCCS 学者的智慧，积极倡导并践行文化研究集体写作的模式，结出了累累硕果：霍尔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著作有《通俗艺术》（1964）和《控制危机》（1978）两部；合编有《通过仪式反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以下简称为《通过仪式反抗》）（1976）、《论意识形态》（1978）、《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1980）、《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1989）和《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7）等六部；个人论文集《通向艰难的复兴之路》（1988）一部；学术论文数百篇，主要收录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新左派评论》、《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大众传播与社会》、《银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今日马克思》等刊物上。霍尔的这些著述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聚焦在电影、大众媒介、大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种族、民族性、身份认同、现代性、表征、差异的政治、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主题上。霍尔在世界范围学术演讲百余次，接受采访十多次。

^① 牙买加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这里原本是土著印第安人的居住地。但从16世纪开始就沦为西方的殖民地，1509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655年被英国占领，1866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62年才最终获得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在经济上不断成为一个独立和完整的国家，但是在文化上却依旧依附于大英帝国，这是独立后的牙买加必须要面临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所在。也是我们在思考霍尔理论中有关牙买加地区文化身份、族裔散居等理论问题时需要牢记的核心问题。

霍尔著述颇丰,其中一些篇目已经成为文化研究著述中的经典,被收入各种文集中,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学者广泛的关切,并引发了浓厚的学术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对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

霍尔在践行文化研究批评的过程中,从未沉溺于个人的乡愁记忆,而是反思性地把个人游学的经历与英国社会政治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践“独立左派”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其中,晚期现代性语境、殖民与去殖民的结构性条件以及后殖民文化问题等已经塑造了霍尔个人的主体性和他从事文化研究的介入性。同时在他的研究中,其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是“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从事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核裁军运动、新左派、成人教育、晚期现代性、后殖民文化理论、族裔散居美学、文化认同及其转向、种族、文化表征以及差异的政治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思考和启发。台湾清华大学的陈光兴教授曾指出:“要真正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思想、书写和介入,至少从三个方面把握,理解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身份:第一,他是新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新左派评论》首任主编,霍尔的象征意义在雷蒙德·廉斯去世以后已无法被取代;第二,他身处文化研究的重镇伯明翰大学,影响甚大,是其他文化研究者无法比拟的;第三,他是加勒比海非洲黑人后裔,也是战后第一代移民,他积极投身到反种族歧视运动,为少数人开拓文化空间,建构具有批判性的文化主体性。”^①这种认识指出了研究霍尔文化理论的三大坐标,那就是霍尔的新左派生涯,CCCS杰出的思想传承者、继承人和集大成者,以及族裔散居知识分子,这是陈光兴从宏观整体的角度诠释出霍尔及其思想,把握了霍尔文化理论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但是,如果要深刻透视霍尔文化思想发展的变化过程,凸显霍尔文化理论中的“问题意识”,陈光兴的认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① 陈光兴、Stuart Hall:《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页。